

疾病的時代徵候——韓國文學中的疾病及其隱喻

崔末順*

國立政治大學

摘要

人的一生不可能不會生病，因而只要文學不停止審視人的生命，疾病似乎就無可避免地會被拿來做為文學創作的題材或內容。疾病雖然是一個由科學診斷繼而進行治療的對象，但人類一直以來卻喜用宗教或文學來面對它。再且，疾病在文學中的再現，往往並非疾病本身，反而它常與腐敗的政治、社會或人性扯上關係。特別是現代小說在面臨生活或社會和政治的異常現象時，也經常會以一種隱喻或象徵方式將疾病文學化。因此，毫不誇張地說，疾病母題幾乎都會出現在所有的現代小說裡，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

基於這個認知，本文將嘗試按照不同時期找出韓國近現代小說中被提及頻率較高的疾病，並舉出較具代表性的小說，作為介紹韓國文學中疾病隱喻的參數。文中所討論的疾病有近代小說中的天花、神經衰弱、梅毒，以及現代小說中的心理創傷、癲瘋病、老年癡呆症等等，而提及的作家、作品，有李海朝〈驅魔劍〉(1908)、廉想涉〈標本室的青蛙〉(1921)、蔡萬植《濁流》(1938)、黃哲暎〈歸來者〉(1970)、李清俊《你們的天國》(1975)、朴婉緒〈泡沫之家〉(1976)等，以及為了觀察韓國文學對近年來成為全球熱門話題的 COVID-19 的思考，將簡單地把韓國文學中涉及此議題的小說按主題分類並進行討論。

關鍵詞：韓國文學、疾病隱喻、時代徵候、COVID-19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The Signs of an Era of Illness: Disease and Its Metaphors in Korean Literature

Mal Soon Cho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 person's life is inevitably marked by illness. As long as literature continues to examine human existence, it seems inevitable that illness will be used as a subject or theme in literary creation. While illness is a subject for scientific diagnosis and subsequent treatment, humans have always turned to religion or literature to confront it. Furthermore, the representation of illness in literature often focuses not on the disease itself, but rather on its connection to corrupt politics, society, or human nature. Modern novels, especially when faced with abnormal phenomena in life, society, or politics, frequently metaphorize or symbolize illness. Therefore,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theme of illness appears in almost all modern novels, with only differences in degree.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dentify the diseases mentioned most frequently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Korean novels from different periods. It provides examples of representative novels in order to introduce the use of disease metaphors in Korean literature. The disease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include smallpox, neurasthenia, and syphilis in modern novels, as well as psychological trauma, leprosy, dementia, and COVID-19 in contemporary novels.

Key words: Korean Literature, metaphor of disease, signs of the times, COVID-19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壹、疾病與文學

人的一生不可能不會生病，因而只要文學不停止審視人的生命，疾病似乎就無可避免地會被拿來做為文學創作的題材或內容。疾病雖然是一個由科學診斷繼而進行治療的對象，但人類一直以來卻常以宗教或文學面對它。古希臘人將疾病視為眾神的憤怒；十四世紀黑死病席捲歐洲時，歐洲基督教徒也是如此看待；堪比二十世紀癌症的十九世紀肺結核，在浪漫主義的影響下被美化為愛情病，文學中悲劇愛情的主角往往會以肺結核患者的形象出現；當原本流行於印度孟加拉地區的霍亂通過英國殖民者傳播到中國和整個東亞時，也有人認為這是各地的邪靈所為；1980年代愛滋病開始蔓延時，西方保守派指稱它起源於同性戀，認為是「變態地追求性快感，招致上帝的震怒」所致；進入2000年代，從中國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被認為是由髒亂的環境和食用野生動物的習慣所引起，因而出現黃禍論的言論，這與愛滋病爆發時質疑其源自非洲而有黑禍論的說法如出一轍。然而，隨著霍亂、天花、肺結核等傳染病的病原體從十九世紀末開始被科學一一鑑定，疫苗和治療方法得以研製，為治療開闢了道路之後，愛滋病也能獲得妥善的治療及控制，不過這並不是因為道德放縱的自我反省，而是在科學診斷的基礎上發展出治療方法之故。儘管如此，拿疾病做為創作的隱喻手法依然是一種普遍的習慣，在在顯示出人類終究還是難以跳脫這種框架的局限性。

毋庸置疑，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與疾病及治療有關的內容在人類留下的文學文本中普遍存在：被譽為中國文學之源的《詩經》大量出現有關疾病、醫療及做為藥物使用的動植物敘述；也可以在《左傳》、《莊子》、《呂氏春秋》、以及《三國演義》、《金瓶梅》、《醒世姻緣傳》、《紅樓夢》、《老殘遊記》等古典名著中發現與疾病相關的醫藥寓言故事（孫瑋志）；西方經典荷馬的史詩《伊利亞德》有堪稱「感染的敘事」內容；¹被認為是希臘悲劇典範的《伊底帕斯王》也出現主角拒絕讓阿波羅的疾病通過刺傷他的眼睛來完全主宰命運的情節；中古時代喬凡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通過描述黑死病開啟了《十日談》的故事。

疾病不僅出現於古代和中古的文學作品，在近現代文學中更是普遍存在。尤其是傳染病問題常常被渲染為與當代社會問題有著緊密的關係，大部分小說通過憐憫弱者、哀悼死者、批判權力，將戰勝感染的力量注入在各個時期的思想體系中。譬如，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大疫年日記》（1722）第一個意識到圍繞在感染病周圍出現的歧視和排斥問題；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的《荒涼山莊》

¹ 第一卷題目為〈疫病·阿喀琉斯之怒〉。

(1853) 通過描述倫敦貧民窟的慘狀，指責資本主義釀成貧困和不平等的社會現象因而帶來傳染病；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1939-) 的《使女的故事》(1985) 則通過描繪傳染病爆發後女性成為社會工具的野蠻性，揭露人類問題的根源與父權制度切割不開關係的事實。

在晚於西方進入現代化階段的地區，病菌通常會被拿來比喻為西方的侵略者，抑或當人們無法採取適當措施應對西方的挑戰時，也常將這種情形比喻為生病的狀態。這種將自己比作感染病菌的病人，可以說是一種政治隱喻，他們擔心外國勢力會像細菌般侵入甚至摧毀國族本體，因而動用民族主義與之對抗，利用這種克服恐懼的方式以取代科學上對人體入侵所產生的心理恐懼。如此的疾病政治學，普遍可從晚清至五四時期用「病痛」影射國家時局的衰落和殘敗的中國文學當中窺見：劉鶚(1857-1909)《老殘遊記》的主角名叫「鐵英」，號「補殘」，人稱「老殘」，由其命名不難知道作者意欲塑造一個「補殘」的「鐵血英雄」寓意，作品中搖串鈴替人治病糊口的江湖郎中，首要目的反而是對官場、社會進行考察診療，行醫救人倒在其次；吳趸人(1866-1910)也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1906) 中將敘述者取名為「九死一生」；曾樸(1871-1935)的《孽海花》(1905) 則把敘述者命名為「東亞病夫」。從這些文本中都可以看見晚清小說家藉著作品的隱喻系統暗示社會的黑暗和殘缺，希望民族命運能夠徹底改變(周淑媚 1-25)。

這種情況在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能看見。1921年蔣渭水(1888-1931)和林獻堂(1881-1956)等人籌設「台灣文化協會」，蔣渭水在成立大會的演講時說道：「台灣人現實有病了，這病不癒，是沒有人才可造的，所以本會不得不先著手醫治這個病根。我診斷的結果，台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治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治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研究並施行治療的機關。」他把當時的台灣譬喻成一個病人，斷定他患有「知識之營養不良」，以致成為「世界文化中的低能兒」，因而開出「正規學校教育、補習教育、幼稚園、圖書館、讀報社」等五大處方。²

韓國也不能例外。肺結核、性病、神經衰弱、消化不良等疾病頻繁出現在近代啟蒙期的小說和日本殖民時期各大作家的小說中，深刻地描寫了殖民統治下韓國社會的矛盾狀況。³1945年解放後的現代韓國文學中，也出現很多將疾病與時代狀況聯繫起來的小說，例如以漢生病和傳染病做為母題的從李清俊(1939-2008)的《你們的天國》(1976)到片惠英(1972-)的《灰與紅》(2010)、丁柚井(1966-)的《28天》(2013)，可謂不

² 〈臨床講義〉原為蔣渭水在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的演講稿，經過潤飾之後發表於台灣文化協會《會報》第一期。

³ 金東仁、玄鎮健、金裕貞、廉想涉、姜敬愛、蔡萬植、朴泰遠、李箱、崔貞熙、李孝石等該時期重要作家小說中都有與疾病相關的敘事。

勝枚舉。這些小說大都透過對疾病災難的想像來構建人類尊嚴的語言。此外，面對 2019 年底開始蔓延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現象，韓國文學也從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經濟不平等和共同體危機等多個層面，對此次傳染病的發生、傳播及各國因應做出反思之舉。

如此，與人類生活密不可分的疾病，無論是東西方或古今都成為文學的常規素材和內容。總的來說，疾病在文學中的再現，往往並非疾病本身，反而它常與腐敗的政治、社會或人性牽扯上關係。特別是現代小說在面臨生活或社會和政治的異常現象時，經常會以一種隱喻或象徵手法將疾病現象加以文學化。因此，毫不誇張地說，疾病母題都會出現在幾乎所有的現代小說裡，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基於這個認知，本文嘗試按照不同時期找出韓國近現代文學中被提及頻率較高的疾病，並舉出較具代表性的小說做為介紹韓國文學中疾病隱喻的參數。另外，為了觀察韓國文學對近年來成為全球熱門話題的 COVID-19 的思考，將簡單地把韓國文學中涉及此議題的小說按主題分類並進行討論。

貳、天花、神經衰弱、梅毒：追求現代與抵抗殖民的政治隱喻

在本節中，擬先考察和介紹韓國近代小說中出現的疾病類型、敘事意義和政治隱喻。與東亞其他地區一樣，韓國也不可避免地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提出開港要求時進入了近代階段，⁴且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國際政治力學中淪為日本殖民地。在韓國歷史上，進入日本殖民時期之前的階段通常被稱為近代轉型期或是近代啟蒙期，而這一時期也引入了現代理性思維和科學新知識，即所謂的現代性。當時朝鮮朝廷試著尋求透過制度改革⁵朝向近代社會發展，在此過程中，隨著現代醫學和衛生學概念的引進，去神話與反迷信的知識和科學成為社會的主流論述。⁶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近代轉型期的主流小說樣式「新小說」，⁷就打著啟蒙大眾的旗幟，刻畫麻疹、天花等當時頗為猖獗的傳染疾病。特別是隨著牛痘接種術的普

⁴ 關於「近代」這一歷史時期有多種說法，但韓國學界普遍接受的觀點是指從 19 世紀開港期到 1945 年二戰結束、從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時期。

⁵ 1897 年 10 月，高宗將國號從朝鮮改為「大韓」，並自立為皇帝，推行以皇室為中心的近代化政策，以實現國富民強為目標，該改革政策叫作「光武改革」。

⁶ 近代時期韓國文學的時代歷史脈絡，請參考崔末順，〈韓國近代文學的形成與殖民地時期文學面貌〉，《吹過星星的風：韓國小說大家經典代表作·戰前篇》（台北：麥田出版社，2020），頁 5-14。

⁷ 「新小說」指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產生的小說樣式，也稱為開化期小說，主要是為啟蒙大眾而書寫。

及·天花做為最具象徵意義的疾病順勢出現在新小說中·其主要目的就是高呼反迷信·同時提倡文明啟蒙運動。天花是一種急性傳染病·有痘瘡·疫疾·戶疫·媽媽·客人等各種稱呼·它在傳統韓國社會中被認為是非常可怕的疾病。天花以病毒為病原體·通過接觸或空氣傳播·症狀包含突發高燒·全身出現皮疹·癒合後傷口會殘留為麻子·症狀嚴重的話可能導致死亡。根據東方醫學典籍記載·天花是從周末秦初時開始出現·在現代預防醫學建立之前·韓國人普遍都認為天花的發病是因「痘神」的造訪所致。因此·為了避開痘神·而有舉行祭祀·供奉貢品·甚至在痊癒之後還要舉行祭祀來拜送痘神的習俗。進入近代階段後·西方與日本的現代醫學知識傳入·池錫永(1855-1935)引入牛痘接種法之後·⁸天花的危害才逐漸消失。

李海朝(1869-1927)所寫的新小說《驅魔劍》(1908)⁹是反映1870年代朝鮮開港後開始接受西方醫學概念的作品。正如篇名所示·魔鬼象徵著迷信的思想和行為·而劍則象徵著懲罰它們的科學思維方式。換句話說·它重複了傳統小說中的勸善懲惡主題。這裡所要懲治的惡人是一個有迷信思想的愚人或利用迷信從事違法亂紀活動的罪犯·而以現代理性·制度·醫學來懲罰他們的人才算是善人。該篇故事梗概如下：住在首爾的咸鎮海家境富裕·屬於知識份子階層·但他並未有生兒育女的福氣·雖然在娶進第三任妻子崔氏後生下了兒子萬得·最終卻無法保住孩子。崔氏成長於瀟灑迷信的薩滿村·兒子即使患上小感冒也會叫上薩滿驅邪·還說兒子會患病是因為原配和二配的鬼魂搞鬼所致。咸鎮海告誡崔氏迷信是徒勞的·但她始終不聽。有一天·萬得染上天花·崔氏卻扔掉咸鎮海買回來的藥·然後一股腦地進行驅魔儀式·但最終還是失去了孩子。然而她仍然深信驅魔之所以失靈是因為犯了忌·而這些過錯全在丈夫身上。崔氏召集巫師金鈴再次為她死去兒子的靈魂祈福·並進行大規模的驅魔儀式·其後咸鎮海也漸漸中了巫師的詭計。之後他們不顧堂兄咸日清的勸告·將祖先的墳墓遷葬·試圖再次生子·但最終由於女巫·巫師和風水師的陰謀導致家族蒙羞。故事結尾描述了在咸家召開的家族會議·咸日清的兒子咸宗表繼承宗門之位·他全心全意為家族服務·讓他們認識到迷信的愚蠢·最後咸宗表在學習新學問後·成為法官·專司懲治惡人工作。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作者相當仔細地揭露愚昧婦女被迷信所惑的過程·同時指出其中不合理與不公正的現象·此外還塑造出一心學習新學問·全力批判迷信的咸宗表角色·以與陷入迷信漩渦的崔氏形成鮮明的對比·宛若是對過去病態的迷信敲響警鐘。咸宗表獲得新知識並成為一名法官·

⁸ 1796年·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 1749-1823)使用從牛身上提取的牛痘病毒作為接種疫苗·用以預防天花。

⁹ 1908年4月25日至7月23日連載於《帝國新聞》·同年12月大韓書林結集成書出版。

旋即逮捕反社會的巫師與風水師，透過法律和正義的審判懲罰他們。在藉著法律執行懲罰的過程中，迷信的徒勞性和隱藏在其中的欺騙屬性終被揭發。如此，巫師與風水師的驅魔術和風水文化顯現的是違法、欺騙及邪惡行為的象徵，相比之下，法官則是正義的守護者、審判者和社會改革者。

在治療天花的方式上，以崔氏為代表的迷信和不文明應對，與現代醫學和牛痘法的科學應對是相互衝突的；至於發病原因，前者認為是神靈對人的罪惡降下的懲罰，後者則理解為病原體的侵入，分別顯示各自不同的疾病觀點。小說通過這種對比，建構一種反對薩滿教的教化啟蒙論述，雖然迷信的觀念和風俗習慣，從追求文明的角度來看只能說是愚昧和落後的事物，但在小說中目睹的威勢和影響力可不算小，因為在前近代社會中，缺乏與疾病相關的科學知識必然會害怕因病死亡，迷信觀念因此而有發揮作用的空間。故事中控制愚昧的巫師和風水師，就是利用這種愚民的恐懼心理鑽空致富，而正面人物咸宗表通過現代知識和法律途徑懲罰他們。咸宗表不僅挽救了自己的家門，還懲治了以非法手段擾亂社會、危害國家的罪犯。在這裡，天花具有疾病政治學的意義，因為它超越了身體疾病的階段，延伸到社會疾病狀態。¹⁰這部小說的結局與公安小說一樣，展現出懲惡揚善的寓意，目的是消滅有如天花般的社會罪惡進而建立新社會，而天花此一疾病是為建構新社會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所援引的媒介物。可以說，天花所隱喻的是前近代社會的病態，接種疫苗代表清除頑劣的病態時代，而戰勝天花的牛痘法和免疫力則可隱喻為正面積極的現代價值，它不僅是抵禦社會毒菌的保護盾，也可以打破舊有的世界觀。綜上所述，這部小說通過天花的疾病敘事傳達出文明開化迫在眉睫，而現代醫學則成為文明和為啟蒙辯護的隱喻。

第二個要考察的疾病是神經衰弱、瘋狂等精神異常的症狀，這些症狀在 1920 年代的小說中相當常見。廉想涉（1897-1963）、金東仁（1900-1951）、羅稻香（1902-1926）、玄鎮健（1900-1943）等主要活動於 1920 年代的作家作品中，即常出現瘋狂、精神疾病、失眠、怨恨、易怒、歇斯底里、神經衰弱、絕望、無助、憤怒、抑鬱和死亡衝動等負面情緒與精神異常的相關內容。¹¹正如學者們所提到，瘋狂的知覺樣態和表達方式之間的親和力是現代文學的一種詩學特徵（李在銑 48），文學中的瘋狂和精神異常往往源於與現代社會的互動關係。1920 年代韓國小說中人物的精神異常也並非單純的個體心理問題，而是隱含著與被殖民狀況相關的社會文化病症。

¹⁰ 如此疾病政治學現象在〈天中佳節〉（1913）、〈紅桃花〉（1908）等新小說中也有出現，都表現出反對迷信、強調現代醫學的合理性。

¹¹ 有關李光洙早期小說、雜誌《創造》上的小說，以及羅稻香小說中出現的歇斯底里和神經衰弱症，有學者以近代個人主體的一種標誌來認知與詮釋。參考李秀瑛（2004）。

舉廉想涉小說〈標本室裡的青蛙〉(1921)為例¹²即可充分了解如此情況。該篇作品常被列為韓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自然主義小說¹³。主要內容為一個知識份子觀察及判斷一個狂人的內心紀錄。故事大綱如下：失眠、神經症、看到藍色刮鬍刀就會感到恐懼的「我」想要去遠方旅行，並在 H 的邀請下前往南浦。¹⁴ 在平壤轉乘火車時，「我」散步到浮碧樓，並在大同江邊遇到一個長髮男人；在那裡午睡時夢見自己被勒死。在南浦從 Y 和 A 的口中聽到一個瘋子花了三圓五十錢蓋了三層樓房，見到他的那一刻，「我」想起了中學實驗室裡的博物老師而感到恐懼。但是「我」莫名的被那個認為是北極哲學家、南浦瘋子的金昌憶所打動，還寫了一封信給住在首爾的 P，說他是一個自由的人、實現了願望，是一名勝利者。金昌憶之所以發瘋是因為父母突然接連離世、教書時意外入獄四個月，後來又遭到妻子背叛。歐洲大戰結束後，他建立了一個名為「東西方友好協會」的虛擬組織，享有絕對的自由。後來「我」從 Y 的信中得知，金昌憶燒毀自己蓋的樓房後即告失蹤，這個事實帶給「我」許多痛苦。故事的結尾，將「我」在 R 洞山上看到的喪家和三層樓房、金昌憶以及長髮男人聯繫了起來，隱隱暗示著金昌憶的失蹤不會是一個挫折。

這部小說通常被視為充分反映了殖民地的現實，它帶有三一運動後的失敗主義傾向以及知識份子在抑鬱症中停滯不前的痛苦情緒（宋琦楨 39-49）。小說中把「我」的神經衰弱和金昌憶的瘋狂舉動以重疊方式排列呈現，映射出時代的陰暗狀況。像是被塞進標本室成為實驗對象、四肢用大頭針固定的青蛙一樣，感到恐懼全身發抖的「我」，以及被人們視為瘋子的金昌憶，都是處於精神狀態不穩、不健康的主體。故事一開始交代「我」回到首爾後，長達七、八個月的時間，內心極度感到倦怠和抑鬱不安，只能沉浸在酒精和尼古丁中，過著緊張而又不規律的生活，不僅如此，「我」的腦海還經常浮現過去的幻影，夜晚噩夢連連，生活已全然陷入幾乎瘋狂的狀態。為了擺脫這種焦慮和沮喪狀態，「我」只好出門旅行，也因而有機會認識了金昌憶。金昌憶是一個精神分裂、狂妄自大的人物，經常會被周遭人們嘲笑。然而，「我」對金昌憶這個行為異常的社會棄兒感到極大的興趣，並將他的精神異常歸因於受到時代壓迫所致。「我」把他理解為濃縮了所謂黑暗時代痛苦的對象，一個可以減輕我抑鬱症並實現「我」的想法和願望的人。換句話說，「我」對金昌憶會產生好感是因受控於殖民時代的不自由狀況所形成，他的瘋狂是他創作的原動力，因此「我」不同於他人，把金昌憶的精神異常狀態禮讚為健康，承認他是一個勝利者和一個自由人。對「我」這種逼近精神崩潰的人來說，金昌憶的瘋狂被判定為

¹² 1921年8月至10月連載於《開闢》14-16期。

¹³ 白鐵的《朝鮮新文學思潮史》(1948)為始，韓國學界相當普遍持有這樣的看法。

¹⁴ 位於北韓西部的港口城市，目前按行政轄區人口計算是北韓第二大城市。

一種解脫方式。瘋子搭建的不怎麼像樣的三層樓房是一個自由舒適的空間，正如東西方友好協會所暗示的那樣，是一個和解和友誼的空間。在這裡，「我」精神崩潰的心理症狀和金昌憶的瘋狂既是悲慘與陰鬱時代的痛苦象徵，也是逃避現實、超然慾望的隱喻。¹⁵小說中瘋狂等異常的精神狀態被賦予正面評價，代表想擺脫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史無前例的對立和時代的恐怖氛圍，以及作者因參與三一運動而入獄受到思想和身體禁錮等時代歷史的局限，¹⁶這象徵著 1920 年代殖民地朝鮮知識分子急欲擺脫桎梏的一種渴望。可以這麼說，精神崩潰和發瘋被用來比喻為殖民地知識份子虛無、絕望和時代痛苦的某種消解，瘋狂的價值才沒有被否定，反而被肯定為一種天才的象徵或者時代的痛苦標誌。¹⁷

第三個疾病是梅毒。眾所周知，梅毒是最常被拿來作為比喻的疾病，有眾多用它來比喻為道德敗壞或身體虛弱的案例(桑塔格 49)。自古以來，梅毒就被理解為性生活混亂、墮落、不道德的一種徵兆，是上天對人類罪孽的懲罰。特別是生病時的痛苦和令人心生厭惡的症狀，以致被認為是罪惡和污染的標誌，加上它具有垂直感染後代的特性，更被認為是破壞家族的重大疾病。梅毒在 1930 年代的朝鮮，與肺結核、淋病並列為代表性疾病，當時的報刊雜誌經常大肆刊登包括梅毒在內的性病報導(李在銑 154)。該時期刻畫梅毒最具代表性的小說，¹⁸可舉蔡萬植(1902-1950)的長篇小說《濁流》(1938)為例，¹⁹當中出現的流行疾病梅毒，主要是隱喻群山這個新興殖民都市引發社會陷入瘋狂狀態的投機米豆²⁰狂潮。²¹這部小說以一個名叫初鳳的女性受難故事為主要軸線，廣泛描繪了 1930 年代朝鮮社會和下層階級的命運。故事大綱如下：初鳳原是一個天

¹⁵ 廉想涉其他小說如《你們得到了什麼》(1923)、《萬歲前》(1924)也展現出對疾病的想像。

¹⁶ 廉想涉 1919 年在日本遇到三一獨立運動，他當時向居住在日本大阪的朝鮮人抄寫及分發了「三一獨立宣言書」，被日本警方抓獲並服刑十個月。

¹⁷ 另外，1920 年代傾向派小說(普羅小說的前身)中也有出現人物進入暫時的瘋狂狀態進而犯罪的情節，他們主要以社會受害者的身份出現，瘋狂和犯罪主要是做為解決階級衝突的手段。

¹⁸ 此外，李孝石的《玫瑰病了》(1939)、李光洙的《泥土》(1933)、沈熏的《常綠樹》(1936)和《織女星》(1935)等小說中也出現梅毒的敘述。

¹⁹ 1937 年 10 月 12 日至 1938 年 5 月 17 日在《朝鮮日報》連載 198 期，1939 年博文書館結集成書出版。

²⁰ 米豆指的是在米穀交易中，泛指利用大米價格的波動，僅憑口頭承諾進行交易的投機行為，並非以實際大米交易為目的。

²¹ 關於《濁流》中的梅毒，也有觀點認為，它不是一種社會欲望和瘋狂狀態的隱喻，而是一種透過破壞人物的軀體和精神用以嚴重破壞他們的社會關係的實際疾病。參考徐熙媛(2014)。

真無邪的女孩，也是住在群山米豆場附近丁主事的女兒，自幼生活無缺。她雖然有個喜歡的對象南昇載，卻還是遵從父命嫁給一個迂腐的銀行職員高泰洙，婚後她的丈夫因與有夫之婦通姦而被殺害，丈夫遇害當天她又不幸遭到駝背張亨寶強姦。在離開群山的途中，初鳳被父親的朋友朴濟鎬誘騙說要和他一起生活，但當張亨寶再次出現時，朴濟鎬卻拋棄了她。懷上張亨寶的孩子並被脅迫與張亨寶一起痛苦生活的初鳳，最終在殺死仇視的張亨寶之後，向警方自首認罪。

這部小說的特色正如標題「濁流」所暗示的那樣，汙濁不潔的時代與做為主要場景的港口城市群山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群山是韓國代表性的大米出口地，與穀倉全州平原以及江景平原一帶、錦江流域的大米集散地相毗鄰，也是繼 1897 年木浦開埠以後做為西部通商口岸新開關的港口。自開港以來，群山與日本大阪的綿米交換貿易一直非常活躍，其後一躍成長為殖民地朝鮮第一大米貿易港。有此背景，群山陸續建設了各種現代設施，也形成了一塊日本人群居的居住地，都市因此劃分為日本人居的中心地區（全州洞、本井洞）和朝鮮貧民集體居住的外圍地區（開福洞、九福洞、屯栗里），此後群山朝著二元結構的殖民地新興城市發展（崔末順 405-29）。可以說，自 1920 年代以來，隨著大米貿易、仲介、商業和金融相關的殖民資本的滲透，群山儼然成為一個眾人心目中經濟利益優先的慾望城市。

將群山的生活方式壓縮呈現的典型空間為米豆場，而推動《濁流》敘事的主要動力則是與米豆、期米有關的投機行為。換句話說，這部小說是生活在以米豆場為中心的經濟活動漩渦中群山人民的故事，米豆場就是殖民資本主義運作的代表性空間，充分展現出人的金錢慾望和為此引發的爭鬥行為。大米價格的波動反映了殖民投機資本流入和交易經濟的現象，米、錢、米豆在這裡是慾望的媒介。位在其中心的群山米豆取引所是代表 1930 年代朝鮮社會蔓延的投機空間，米豆和期米被刻畫為一系列具有賭博性質的非正規經濟活動。小說清楚地呈現圍繞於米豆的貪念像瘟疫一般感染、傳染、蔓延到人物身上，可以說包括米豆取引所在內，整個群山存在著殖民資本主義無可控制，以及環繞在競爭利己主義和賭博盛行的病理性環境。

住在這裡的人大多來自外地，他們不是追逐利益的投機客，就是在外地度過艱難生活的一群「沒有明日的」人們。在群山，他們的生活直接或間接地都與米豆場有關：丁主事、高泰洙、張亨寶都是沉迷於炒作米豆投機的人，同時也是道德敗壞、放蕩的浪子，更是不惜違法犯事的罪犯。這些投機成癮的人不僅做出反社會行為和道德敗壞的事情，嚴重的甚至還會危及家人的性命。丁主事將初鳳嫁給高泰洙，為的是希望能夠從中得到錢財。高泰洙是一名銀行職員，但背地裡卻是一個騙子和捲入米豆投機行當的好色男人，他曾是京城總公司的模範行員，但來到米豆之都群山之後便開始墮落貪腐。他勾結張亨寶插手米豆事業，犯下詐欺和挪用公款等違紀行為，甚至做出道德淪喪的通姦行為，進而陷入性狂歡狀態。張亨寶是一

個只知道金錢的惡人，由於身體殘缺的自卑感和彼時社會對駝背的蔑視而對世界懷恨在心、充滿敵意，他為了洩憤強姦了無辜的女子初鳳，最終迎來的結局是被初鳳報復、殺害。

《濁流》藉用梅毒來比喻帶有傳染性的貪婪慾望。遊廓和聲色酒家林立的群山是性病梅毒的傳染源所在，這是一個經濟貪婪和性貪婪有如濁流的地方。小說中梅毒從韓參奉的小妾傳給他之後，韓參奉再傳給妻子金氏，而金氏由於對生子的渴望和性慾望而與高泰洙發生關係，因此又傳給生性好色的高泰洙、妓生杏花以及他的妻子初鳳，之後初鳳再傳染給藥劑師朴濟鎬，而經常出入遊廓的張亨寶也無可避免地受到感染。這種梅毒的連續傳播，對應的是透過非法投機手段想要攫取財富的慾望。換句話說，《濁流》中的梅毒不但直接反映出性病氾濫的社會實況，同時又做為隱喻來指涉猶如瘟疫般蔓延的貪婪，以及由此招致的道德敗壞和報應。蔡萬植一向被認為是最能夠徹底掌握殖民資本主義的運作機制並進行文學刻畫的作家，毫無疑問的，他的《濁流》也相當仔細地剖析在日本投機資本湧入的背景，一個被梅毒一樣蔓延的貪婪慾望所摧毀的病態社會。梅毒代表的就是外因性疾病，正如它通過婚外情傳播、是破壞婚姻紐帶的疾病一樣，日本不正當的投機行為和資本流入，感染和腐蝕了殖民地社會正常、健康的生活，可說是 1930 年代殖民地朝鮮的一種隱喻。

參、心理創傷、癲瘋病、老人癡呆：戰爭記憶與社會壓抑的隱喻

1945 年二戰終結，韓國脫離 36 年的日本殖民統治進入了民族國家的建設階段，但由於終戰過程裡已埋藏了美蘇對立的種子以及其延伸的效應，韓半島陷入了一場內戰紛爭，結果目前仍然是世界上少數民族分裂的國家之一。加上，二戰後在世界冷戰體系整備之際，南韓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自由陣營，在意識型態和軍事上處於強烈的反共態勢，並在政治上因為長期的軍事獨裁統治和經濟上接受持續十多年的美援，整個國家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邊緣位置，朝著由國家主導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的產業化方向發展。由上述這些原因導致戰後韓國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不僅是社會共同體迅速解體、傳統遭到破壞、城鄉及貧富差距變大，支配/被支配結構所造成的僵化和壓抑氛圍在社會上蔓延，集體意識而非個人主體認同構成了社會基礎。²² 可以說，內戰和民族分裂、軍政的壓抑、快速進行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所造成的弊害與矛盾，直到 1980 年代依舊是韓國社會的主要面貌。²³ 於是，戰後韓國小說中出現的疾病也可以看作是對在這

²² 有關二戰後韓國社會和文學的相關性，參考崔末順（2021）。

²³ 隨著戰後工業化的進展，韓國社會以男性為中心進行重組，1960 年代韓國小說

些條件下發生的社會現象的一種隱喻。

首先要看的是，與戰爭經驗有關的心理創傷。位於亞洲大陸和日本列島之間的韓半島，自古至今一直處於戰爭的威脅之下。²⁴但最為嚴重的還是1950年起持續三年的韓國戰爭，它是美蘇冷戰對立的代理戰，同時也是韓國民族自我相殘的悲劇，對往後的韓國社會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除了韓戰之外，1964年至1973年的越南戰爭也對韓國人造成相當大的影響，當時越戰被認為是亞洲防共之戰，韓國派出32萬人次的大規模作戰部隊前赴越南。這個戰爭也為韓國社會留下了廣泛的傷痕，許多小說中都在處理相關問題。²⁵可以說在韓國社會，越戰的意義不亞於韓戰。如果說韓戰是發生於同民族之間，那麼越戰就是做為美國盟軍參戰的他國戰爭。當時在所謂「骨牌效應」的反共名分下死傷無數，但原做為戰爭名分的反共意識型態卻逐漸淡化，戰場最後變成以黑市和美元為代表的資金競技場，更嚴重的是參戰士兵普遍留下投入殺戮場域的痛苦記憶。在戰場上雖然是為國而戰，但其名分消失後，剩下的只是沒有目的的「殺人」記憶而已，而這些殺戮記憶造成的罪惡感則留下了嚴重的心理創傷，歸國後也一時難以過上正常的生活。

有實際參與越戰經歷的作家黃皙暎（1943-），通過多部小說來描寫與越戰相關的問題。²⁶其中，〈歸來者〉（1970）既涉及越南戰爭，也討論韓國戰爭。以萬秀一家故事的中心事件所環繞的韓戰，和以「我」為中心的越戰做為小說的主要素材，清晰地揭示了受害者和加害者的不同立場。敘述者「我」退伍後從戰場歸來，雖然胸前沒有戴著榮譽勳章，但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逐漸找回了生活節奏。然而，剛從戰場歸來不久，「我」就開始莫名的感到身體不適，像是發高燒，出現胡言亂語等「半睡」症狀。後來只好在家人的介紹下到舅舅的果園休養，「我」在那裡遇到了兒時的朋友萬秀。萬秀家曾經是富裕的農民，住在「我」母親家附近的西村，但現在他的家境日漸衰落，目前住在東村。在韓國戰爭期間，身為地主的萬秀父母被朝鮮人民軍殺害，而萬秀的大哥當時遭到嚴厲的拷打，至今仍像瘋子一樣活著。留在「我」外婆家附近的萬秀和他的家人，被描繪成韓戰悲劇所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傷痕。

在〈歸來者〉中以韓戰做為媒介，讓從越戰歸來的「我」想起了戰爭中犯下的罪行。「我」目睹了萬秀和他的嫂子折磨那個韓戰期間害死他父

中的女性性（sexuality）被視為威脅社會的一種精神疾病。參考宋仁和(2020)。

²⁴ 前近代時期有蒙古人和滿族人從北方入侵，日本人也曾擾亂過韓半島。19世紀末以來，日本和俄羅斯以韓半島為立足點分別爭相進軍亞洲大陸，韓半島最終被日本佔領。

²⁵ 迄今為止，已知有大約50部以上的韓國小說描述越南戰爭。

²⁶ 黃皙暎以越南戰爭為題材的小說包括〈塔〉（1970）、〈駱駝眼珠〉（1972）、〈鄰居〉（1972）、〈茉莉月之鳥〉（1976）、《武器的陰影》（1992）等。

母的男人的場景，而開始回憶起自己在越戰中犯下的殺人行為。「我」和「我們」將俘虜「潭」逼死，以及「我」在搜查村莊的過程中槍殺了躲在甕裡的老人和抱著嬰兒的男孩。這不能說是戰爭勇士所當為，而是明確的加害者行為。「我」奪走了那些人的生命，奪走了那些人的一切。「我」在退伍後開始出現失眠和幻覺症狀，是因為在戰場上以軍法名義殺害無辜越南人的行為所造成，可以說是一種創傷性障礙症狀。具有這些經驗的軍人即使在退伍後仍會不斷回憶起自己在戰爭中經歷的事情，遭受著戰爭帶來的精神創傷，他們容易受到驚嚇、易怒和難以入眠。「我」之所以無緣無故出現幻覺和失眠，其實是為了忘記自己就是加害者的事實而造成的一種心理機制，但是在舅舅家遇到的萬秀讓「我」想起了自己的罪行，也明白了自己不眠的理由。

黃皙暎通過〈歸來者〉將韓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事件——韓戰和越戰聯繫起來，讓我們意識到韓國軍人在越戰中犯下的殘酷行為。幻覺、失眠等創傷後的障礙症狀，就是反映了他們在戰場犯下屠殺行為後產生的罪惡感。小說安排的人物心理創傷，其功能在於提醒我們記住民族悲劇韓戰的真相，以及在反共邏輯下介入越戰的後果，可以說這是對國家的一種批判，指控國家迫使人們為國犧牲，然後又沒當回事的忘記它。雖然在軍隊為理念或為國家利益參戰時，軍人也會產生為人民犧牲的榮譽感，然而在戰場中的實際經驗並不這麼單純，個人生命不但會受到威脅，也會產生因為親眼目睹戰友在身邊死去後感到自己是唯一倖存下來的內疚感。不僅如此，必須把槍口對準所謂「敵人」的經驗，事過境遷後會留下龐大的心理陰影。短期內經歷過韓戰、越戰等世界性戰爭的韓國，普遍存在以「我們」為名的國家利益至上的意識。小說中的敘述者「我」懷著為國爭光和自豪的心情參戰，然而從失去正當理由的戰爭中退伍歸來，第一次對自己的使命感產生了懷疑，開始思考在戰場上犯下的各種暴行是否正當。隨著美越戰爭時間的延長，美國本土也出現對越戰的負面輿論，久而久之越戰變成一場沒有正當性的戰爭，到頭來只剩下比作黑市和借殼交易武器的戰場。經歷這些戰爭經驗的士兵在回憶起戰場上的各種暴行的瞬間後再也無法適應社會，甚至會出現創傷後遺症。因此，小說中的心理創傷是批判國家主義殘酷現實的一種手段。

韓國戰後現代小說中的第二個疾病為癲瘋病。傳統以業病、天刑認知的癲瘋病，因在感染後會留下令人厭惡的痕跡而又被稱為癩病，至 1873 年後，又以發現該病原體的挪威醫生名字命名為漢生病。這個疾病因具有傳染性和在過去被認定為具有遺傳性，發病後會被強制隔離和監禁，病患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因此受到剝奪。在韓國小說中，癲瘋病患者大都描繪成讓人感到恐懼的對象，原因是從日據時期到 1950 年代，癲瘋病患者食人肉治病的報導時常出現，大眾對此有超越疾病以上的恐懼。韓國小說從 1930 年代開始出現以漢生病為題材的作品，大部分都會描述一般人對此

疾病的恐懼心理。²⁷

其中，李清俊的長篇《你們的天國》（1976）是漢生病相關文學中最受矚目的作品，評論家說它寓言性地描繪了1970年代的韓國社會（裴慶悅 143-68）。《你們的天國》以真實事件做為題材，在李清俊的小說中佔有獨特的地位，同時也討論了有關語言和權力的問題，呈現他一貫的批判性思維（金庸求 37-72）。小說講述了前往小鹿島²⁸醫院赴任的趙白憲上校，基於對漢生病的準確了解，尋求消除一般人歧視漢生病患者的故事。小鹿島醫院建於1916年的日據時期，1935年成為最大的漢生病患者集中營所在地，普遍被視為隔離、禁閉和排斥的象徵性場所。故事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了五一六²⁹之後就任小鹿島醫院院長的趙白憲上校，在了解小鹿島的整體狀況後決心將死者之島改造為漢生病患者的天堂；第二部分較為仔細地交代了趙上校的努力過程，為漢生病患者打造樂園而開始進行填海造地事業，卻因遇上暴風雨和土地沉降問題陷入困境，並遭到黃長老和李科長的質疑與批判，他們認為趙上校計劃的漢生病患者天國，反而剝奪了他們的權利且結果會造成他們孤立無助；第三部分講述了離開島嶼的趙院長以市民身份回歸，並主持兩個未感染漢生病的年輕人婚禮。

按照作者自己的說法，這部小說通過最高管理者的政策和經營方針，旨在影射政治權力進行控制的樣貌，同時通過漢生病患者想要逃離和逃脫的異常狀態來表達當時的國情與人民內心的願望。小說呈現的拘束和自由的辯證關係、漢生病患者被隔離的小鹿島空間、佩戴手槍和穿藍色制服的軍人院長等因素，明顯象徵著當時軍人統治的國家秩序和社會結構。1961年開始出帆的朴正熙軍事獨裁政權，在1970年代初期以國安危機和國際關係為藉口建立了相當於戒嚴的維新體制，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小說中小鹿島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空間或地方，而是一個代表禁閉、束縛、不健康和疾病的空間。現役軍人趙白憲是負責行政的醫院院長，同時也是一個醫生。他做為院長維持醫院秩序、管理漢生病患者，同時在緊急的情況下直接治療他們、照顧他們。但由於缺乏對話，該島始終處於死亡般的寂靜狀態，而趙院長又將此病視為精神疾病，因此組建了漢生人足球隊並進行填海工程以尋求治療可能。這些工作的目的是為促進島民和患者之間的交流，但由於是上級單方面做出的決定，因而發生了不信任和下屬的背叛行

²⁷ 與此相關的小說有金東里的〈巖石〉（1936）、金廷漢的〈玉心〉（1936）、金聲翰的〈寂靜之谷〉（1954）、崔仁浩的〈野蠻人〉（1971）等，可說各個時期都有。

²⁸ 小鹿島位於韓國西南部全羅南道高興郡道陽邑的小島，因形狀酷似小鹿而得名。

²⁹ 1961年5月16日，陸軍少將朴正熙、金鍾泌等軍隊要員發動軍事政變，標誌著往後持續30多年軍人政權的開始。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等軍人政權是韓國民主的黑暗時期，畢竟軍事政變是違反憲法秩序的武裝行為，它嚴重破壞了程序民主。

為，這導致患者和島民關係更加疏遠。由此產生的趙白憲、黃長老和李科長之間的對峙，代表著優劣二分法結構中正常 / 異常和健康 / 不健康之間的溝通困難，很自然地可以理解為上位者與下位者之間敵對關係的比喻，具備了支配 / 從屬關係的政治寓意。換句話說，《你們的天國》在人物和空間體系上呈現出支配 / 從屬、自由 / 禁錮、健康 / 疾病等二元結構，圍繞著漢生病的管理者 / 被管理者關係充分具有政治性的解讀空間，其中的漢生病做為一種身心疾病，隱喻著處於被管制、不健康和被迫沈默的當時韓國社會的狀況。³⁰

第三個疾病是老人癡呆。癡呆症是由大腦慢性或進行性疾病引起的一種症候群，可定義為大腦皮層功能的多種障礙，包括記憶、思考、理解、計算、學習、語言和判斷上的問題。癡呆症有多種類型，其中阿茲海默症也可稱為老年癡呆症，是最為人熟知的一種。癡呆症的主要症狀之一是記憶障礙，在文學作品中相當常見。記憶障礙做為癡呆症的共同特徵，其症狀有談話中會重複相同的話、在陌生的環境中會迷失方向，以及常常會忘記約定時間、人名、居住地等。癡呆症的另一個重要症狀是性格改變，以前很會體諒他人的人在發病後往往會失去對別人的興趣，變成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或著一個活潑的人變得精神萎靡、容易生氣或做出攻擊性行為，如變得焦慮、抑鬱、固執，這種性格變化也常常成為小說題材。

韓國女性作家當中，朴婉緒（1931-2011）最為善長處理中產階級的虛假意識和家中的女性問題。她有不少小說涉及到老人失智和癡呆問題，³¹〈泡沫之家〉（1976）是其中之一，作者曾經表示過自己有長期照顧失智症婆婆和母親的經驗。這部小說主要內容為兒媳照顧癡呆婆婆的經過，容易讓人聯想到人物之間的緊張關係，媳婦的感受特別受到重視。故事中丈夫打著撫養孩子的幌子在美國工作，兒媳則須全權負責照顧生病的婆婆。這種情況增加了兒媳對癡呆婆婆的心理負擔，以致她經常以厭惡的態度對待婆婆。小說詳細描寫了婆婆日益嚴重的癡呆症狀，並從兒媳的角度一再強調婆婆的行為對她來說是多麼地難以應付，例如整天不停地叫喊、指示她幹活。抱怨連連的癡呆症狀其實是一種呼喊他人對自己加以關注的心聲，但敘述者兒媳完全忽視婆婆與家人「溝通」的心願。再加上為治療婆婆失眠而開出的安眠藥處方，反而在她自行服用後陷入沉睡。睡夢中，兒媳覺得自己居住的這間堅實的公寓正一點一滴地化為泡沫，好比說，兒媳意識裡的家族關係如同泡沫般岌岌可危。韓國社會一向被稱作堅固的家

³⁰ 李清俊在其他小說中也透過電燈恐懼症和陳述恐懼症等強迫症或病理症狀，來探索韓國社會的權力運作機制和人們之間的溝通問題。

³¹ 相關小說有〈看家結束了〉（1978）、〈生孩子葫蘆〉（1985）、〈幻覺胡蝶〉（1995）、〈後男，吃飯〉（2003）等。探討包括〈泡沫之家〉在內朴婉緒小說中的疾病意義，可參考金恩貞（2015）。

族共同體，實際上則可能會像泡沫一樣瞬間消失，或許我們對家人的信念很可能是一種虛偽的幻想而已，小說中的癡呆症就是揭露此虛偽意識的媒介。

此外，在丈夫不在家的情況下照顧患有癡呆症婆婆的媳婦，渴望著「不潔的關係」，一次在送婆婆到老人學校的週末，媳婦拉著一個學建築的外遇男進屋，甚至還被兒子看見自己與外遇男幽會。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家族關係仍然得以維持。透過這些情節，作者想表達當代社會中的家庭和個人關係的虛偽性，以家族共同體為名勉強維繫的脆弱家族關係就是一種虛偽意識。

癡呆症的特徵是自我傷害和人格破壞，而不是身體上的傷害。因此正如患者隱藏的人格經由癡呆症狀發顯一樣，照顧癡呆病患的人所隱藏的虛偽意識也透過照顧的過程中表露無遺。但換個角度思考，平常只認定「母親角色」的女性，借此機會認知到自己是個具有個性的主體。無論是做為病人的婆婆，還是做為照顧者的媳婦，長期被韓國社會父權制度壓抑的自我意識、慾望、不滿，以及個人的自我認同，在癡呆症面前一一浮現。癡呆症在這裡是一面鏡子，由此反映出長期受儒家規範約束的韓國現代家庭和家族關係的虛假面貌。

肆、新冠肺炎書寫：厭惡的時代徵候

人類進化成群居動物後的大量死亡大都是由傳染病引起，而傳染病大都發生在群居的生活圈中。所謂傳染病是過去與牲畜共存的細菌或病毒試圖要與人類共存的一種現象，這就是為什麼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傳染病的歷史。傳染病不僅在身體上，也在心靈上留下深刻的痕跡，因此從文字被發明的那一刻起，文學就開始嘗試為面對傳染病所造成的死亡提供思考。被稱為災難小說的開端，阿爾貝·卡繆 (Albert Camus, 1913-1960) 的《瘟疫》(1947) 即描述了人類遭逢鼠疫蔓延、大量死亡、被迫封城等局面而感到極度絕望和恐懼不安的心理狀態，在此之時，醫生、公務員、宗教人士和其他公民挺身自發性地組成了「保健隊」，表現出要團結起來全力對抗瘟疫的勇氣；1998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喬賽·薩拉馬戈 (José Saramago, 1922-2010) 的小說《盲流感》(1995) 書寫了在失明病毒肆虐的城市裡，人類陷入暴力和利己主義的醜陋心態，但作品還是強調必須找到幫助弱者、扶持弱者然後與他們一起生活下去的方法。

2019 年 12 月，一種引起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在中國武漢爆發，並蔓延到世界各地，感染了無數人，也造成多人死亡。命名為 COVID-19 的這個傳染病，被認為是「全球化時代的第一次大規模流行病」和「物種滅絕時代的人畜共患病 (zoonoses)」(斯諾登 27)，其後不但沒能撲滅，還持續傳播至今，影響到多個層面的變化，同時也帶出不少全球性的議題。

譬如：視 COVID-19 為亞洲疾病的「歐洲傲慢」、全球不平等的保健狀況、國家間為開發和確保疫苗的政治競爭、圍繞著正常 / 異常引起的歧視和仇恨等等，無一不暴露出諸多問題，又如社交距離、檢疫、疫苗、自我隔離、城市和邊境封鎖、非面對面交流、禁止集會的行政命令等新的用語，也隨之登場。

在韓國，疫情爆發之時，民眾關心的是如何在各種政府法規所代表的公共利益與個人自由之間尋求平衡，但是後來新天地宗教團體傳出大規模集體感染事件之後，³² 民眾對新宗教頓時感到嫌惡，接著源於梨泰院的第二次群體感染，³³ 使得過往一向對同性戀和性少數群體的排斥情緒進一步升高，甚至根據群體感染的情況，仇恨之箭全面朝向種族、性少數、地區、宗教等特定對象移動，這種仇恨和厭惡，讓民眾有理有據地將傳播傳染病的一切罪過歸咎於他們，也據以作為歧視性言論的辯護。不僅如此，由於 COVID-19 的特徵是透過接觸傳播，人們乃以「安全」為理由被迫強制與外界（包括其他人）「隔離」，因而對於他人的仇恨和歧視情緒也逐漸往外擴散。

這些歧視、排斥和仇恨他人的情況，在 COVID-19 爆發後出版的韓國小說中也相當普遍。參考現有研究成果，可簡要總結如下：裴明勳（1978-）的〈Chakatapa 的願望〉（2020）刻畫一位生活在 2113 年的歷史學徒正在撰寫一篇以 2020 年韓國發生的事情為主題的小論文，小說中的人物討厭與人接觸，為保持安全的生活而身處被隔離的環境中，認為只有那樣才是優越的生活方式，但後來在認識 2020 年的韓國社會的過程中，他改變了原先想法，認為與他人接觸並無不妥，況且他認識到自己的「內部」也有污染原因，從此開始試著摒除厭惡時代的成見；徐章源（音譯，1990-）的〈像法國電影一樣〉是一部全面處理 2020 年初韓國社會出現仇恨問題的小說，內容生動地描繪了一個變性人認知到無法隱藏身份之後感受到的痛苦和絕望心境，其中，就像一部沒有故事也沒有結局的法國電影一樣，小說以悠悠流逝的時間性來比喻性少數者毫無未來希望的生活，讓人印象相當深刻；金鉉（音譯）的〈假想旅行〉（2021）描繪了生活在新冠肺炎疫情時代的同性戀伴侶之間反覆發生的瑣碎爭吵、無聊叨絮、分手和相遇過程，雖然沒有直接吐露因仇恨而感到痛苦的狀況，但透過虛擬體驗面對悲觀的未來，展示出因 COVID-19 而更加被孤立的酷兒生活和他們的內心（李行美 49-90）。

另外，COVID-19 的傳播造成了照顧危機，隨之而來的責任感和疲勞成為家人尤其是女性的重擔。崔恩美（1978-）的〈我們，這裡，面對〉

³² 2020 年 2 月大邱新天地耶穌教教團發生集團感染後，開始逐漸傳播到韓國全境，累計確診病例為 5214 例，堪稱「第一次大流行」。

³³ 2020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5 日的連假期間，位於首爾龍山區梨泰院洞的多家俱樂部發生 COVID-19 群體感染事件，成為「第二次大流行」的導火線。

(2020) 講述了 2020 年春天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護理勞動的強度在最大化的情況下，一位婦女全身投入照顧家人的故事。她是做生意的自營業者，也是努力履行妻子和母親義務的人，但當 COVID-19 開始擴散後，孩子不上學，居家照顧的時間拉長，她因此再也撐不下去。當她知道梨泰院同性戀俱樂部的相關確診者存在於「這裡，我們」的日常空間時，被壓抑的憤怒、仇恨、羞愧、自厭、內疚等情緒彷彿要崩潰般傾瀉而出，最後轉嫁給包括性少數者在內的弱勢階層。憂心感染的恐懼心理以及做為防疫主體的強迫症造成她厭惡別人、處處防備著他人，甚而隨時都會為厭惡弱勢的一方站出來辯護。金裕潭 (1983-) 的〈特別災難區〉(2020)，以 2020 年 2 月慶北清道出現大量 COVID-19 確診病例和數位性犯罪事件兩件災難事件做為題材，講述一個經歷過照顧工作危機的人物故事。主要人物為六十多歲的女性，她一生都在嚴守著父權制度下的規範和習俗，全身投入照顧家人的工作，但因為 COVID-19 流行後醫院禁止探訪，外帶食物也變得窒礙難行以致無法照顧常年臥病在床的父親，甚至連臨終前都無法見上一面，直到父親去世後她才聽到消息。她付出一生的心力照顧家人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因而對人生感到毫無意義，打從心底認為她的努力都是徒勞。不僅如此，小學生孫女成了讓人聯想到 N 號房犯罪案件的數位性犯罪集團的受害者，但她卻沒有能力解決，因而感到茫然，束手無策。透過這兩件事，主角經歷了自我角色的摸索和認同危機，意識到沒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總之，韓國文學中的 COVID-19 似乎與厭惡他者及性別問題有著密切的關聯，這意味著在韓國社會一直存在對少數群體的歧視和偏見，透過它的傳播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在 COVID-19 長期的全球大流行以及我們應對的過程中，大家都目睹了國家、地區、階級和性別之間的不平等問題逐漸浮出檯面，尤其是它必須強制隔離的傳染病性質，造成對他人不信任、排斥和仇恨情緒也隨之蔓延。有鑑於這種現象基本上是全球各國陷入新自由主義無限競爭的濃縮結果，COVID-19 的爆發和蔓延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當前面臨的時代徵候。但是我們在思考未來走向時，與歷史上的任何疾病一樣，面對 COVID-19 有必要透明地看待疾病本身，而不應有任何扭曲或折射的視角。

以上，本文探討了從天花到 COVID-19 等幾種疾病，以及韓國近現代小說中這些疾病具有何種隱喻和象徵的問題。由於韓國的近現代歷史是一個動蕩的時期，小說中人物患上的疾病並非只是簡單地揭示他們身心的異常，更多的是拿來做為韓國歷史處境和時代狀況的一種隱喻。考慮到現代小說大多與疾病有關，本論文的觀察自是有甚多不足之處，但旨在簡要介紹韓國文學中疾病敘事的文學意蘊。

參考文獻

- 白鐵。《朝鮮新文學思潮史》，首爾：白楊堂，1948年。
- 朴婉緒。〈泡沫之家〉，《韓國文學》10月號，1976年。
- 宋仁和（音譯）。〈1960年代女性精神病的再現和歇斯底里：作為性別權力的醫學知識及性愛化的「內心」〉，《女性文學研究》51，韓國女性文學學會，2020年，頁221-50。
- 宋琦楨（音譯）。〈標本室裡的青蛙與時代的憂鬱〉，《文藝運動》112，文藝運動社，2011年12月，頁39-49。
- 李在銑。《現代小說的敘事主題學》，首爾：文學與知性社，2007。
- 李行美（音譯）。〈新冠肺炎後小說與仇恨的臨界〉，《韓國現代文學研究》44，韓國現代文學會，2021年10月，頁49-90。
- 李秀瑛（音譯）。〈韓國近代文學的形成及審美感覺的病理性〉，《民族文學史研究》26，民族文學史研究所，2004年，頁259-85。
- 李海朝。〈驅魔劍〉，《帝國新聞》，1908年4月25日-7月23日。
- 李清俊。《你們的天國》，文學與知性社，1975年。
- 金恩貞（音譯）。〈朴婉緒老年小說中的疾病意義〉，《韓國文學論叢》70，韓國文學會，2015年8月，頁293-332。
- 。〈現代小說所呈現「癡呆」的意義〉，《韓民族語文學》63，韓民族語文學會，2013年4月，頁313-40。
- 金庸求（音譯）。〈李清俊小說的結構〉，《江原人文論叢》13輯，江原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5年6月，頁37-72。
- 金鉉（音譯）。〈假想旅行〉，《文學3》13號，創批，2021年。
- 金裕潭。〈特別災難區〉，《一個我不會寫的故事》，arte，2020年。
- 徐章源（音譯）。〈像法國電影一樣〉，《不知道的故事》，茶山書房，2021。
- 徐熙瑗（音譯）。〈「壞血」或梅毒和瘋狂的敘事〉，《東岳語文學》62，東岳語文學會，2014年2月，頁355-84。
- 周淑媚。〈文化診斷中的病痛隱喻——以魯迅和郁達夫的病痛與文學創作為例〉，《通識教育學報》第15期，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0年6月，頁1-25。
- 孫瑋志。〈中國傳統醫學與古典文學〉，中國作家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813/c404063-30224769.html>。2023年1月8日下載。
- 桑塔格(Sontag, Susan)。《疾病的隱喻》，程巍譯，台北：麥田出版社，2012年。
- 崔恩美。〈我們·這裡·面對〉，《我們·這裡·面對-第66屆現代文學賞小說集》，現代文學，2020年。
- 崔末順。〈韓國近代文學的形成與殖民地時期文學面貌〉，《吹過星星的風：韓國小說大家經典代表作·戰前篇》，台北：麥田出版社。

- 2020年·頁5-14。
- 。〈戰後韓國文學的發展與小說焦點〉·《誰能說自己看見天空：韓國小說大家經典代表作·戰後篇》·台北：麥田出版社·2021年·頁5-28。
- 。〈新興殖民都市的真相：以〈新興的悲哀〉與《濁流》為探討對象〉·《殖民與冷戰的東亞視野：對台韓文學的一個觀察》·台北：遠景出版社·2021年·頁405-29。
- 黃皙暎。〈歸來者〉·《月刊文學》·1970年6月。
- 斯諾登(Snowden, Frank)·〈大流行病的歷史給我們甚麼？〉·《綠色評論》第173號·綠色評論社·2020年7·8月·頁23-39。
- 廉想涉。〈標本室的青蛙〉·《開闢》14-16期·1921年8月-1921年10月。
- 蔡萬植。《濁流》·《朝鮮日報》·1937年10月12日-1938年5月17日。
- 裴明勳。〈Chakatapa的願望〉·《大流行-六個世界》·文學與知性社·2020。
- 裴慶悅(音譯)。〈李清俊《你們的天國》的隱喻考察〉·《民族語》46輯·民族語學會·2010年6月·頁143-68。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Choi Mal So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o.64, Sec. 2, ZhiNan Rd.
Wenshan Dist.
11605 Taipei City
Taiwan

mschoi@nccu.edu.tw

Submitted Date: September 18, 2023

Accepted Date: November 22, 2023

